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社会主义經濟問題

南 开 大 学 經 济 系 編
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經濟研究所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社会主义經濟問題

南开大学經濟系編
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經濟研究所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第三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发行

850×1168 1/32 · 8 $\frac{11}{16}$ 印张 · 229,000字 印数：1—50,000册 1959年10月第一版
195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1086·2 定价：(5) 0.69 元

說 明

为了配合政治經濟学的学习，使学习政治經濟学的同志們能有一本比較現成的參考讀物，我們选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經濟問題的一部分論述，編輯成这个册子。本書共分十七个問題。主要是参考苏联政治經濟学教科書（第三版）的体系，結合我們的实际而确立的。考虑到实际需要，本書并未包括全部政治經濟学問題。其次，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每个問題里也沒有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的論述全部选录进去。选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有些問題里甚至是一小部分。当然这就可能发生选編不妥和挂一漏万之处。

在編輯开始时，由于采用的版本不統一，結果发现譯文中有許多地方跟新版本不一致，在付印前經過查对尽量作了校正。有几个譯文，如“按劳取酬”、“各取所需”“资产阶級式的法权”等都采用最新更正的譯法，故与譯本的譯文不尽一致，这是需要說明的。

参加此書編輯工作的都是学生和青年教师，水平很低，进行这一工作确乎难以胜任，但在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工农业战綫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本着“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为了滿足实际的需要，就毅然地負担起这一任务，希望此書能对讀者有所裨益。缺点、錯誤之处，尙希讀者及时提出批評和指正。

1959年9月22日

目 录

第一题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1
第二题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15
第三题	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22
第四题	国家资本主义.....	40
第五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	50
第六题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57
第七题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计划经济.....	67
第八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70
第九题	劳动生产率问题.....	81
附: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87
第十题	社会主义工业化	110
第十一题	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	129
第十二题	商品生产	149
第十三题	价值规律	182
第十四题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205
第十五题	再生产和国民收入	219
第十六题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238
第十七题	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240

第一題 政治經濟学的对象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直到現在，它的典型的處所是英國。……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序，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頁）

……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一個社會就令已經把它的運動的自然法則發現，它也還是不能跳過或以法令廢止自然的發展階段。但它能夠把生育時的痛苦縮短並且緩和。

（同上，第4—5頁）

政治經濟學在最廣的意義上說來，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那些規律的一種科學。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150頁）

……所以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說來是一種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資料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它首先研究在生產和交換的發展上每一個別階段的特殊規律，只在這樣研究的結束，它才能確立極少的非常一般的、可以用於一般的生產和交換的那種規律，這上面不言而喻，對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適用的規律，同樣也適用於具有同樣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所有歷史時期，例如隨着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的規律發生了作用，這些規律對於所有採用金屬貨幣來進行交換的歷史時期和國度都是適用的。

生產的分配方式與方法，同樣取決於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方式與方法、交換方式與方法，取決於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150—151頁）

可是分配並不是生產和交換的單純消極的結果；分配反過來又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個新的生產方式或新的交換形式，開始

时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结构的阻碍，而且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不得通过长期的斗争来争取与自己相适应的分配。某种生产的和交换的方式，愈是活跃，愈有改造与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愈快地到达这样的地步，即：超越了它所从而产生的那种生产的与交换的方式，并与之发生冲突。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52页）

按广义来说，政治经济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研究人类各种社会中生产和交换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分配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这样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所给予我们的，差不多完全限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生产形式的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为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的必然性，然后从正面——就是说在其还是有利于社会的一般目的的范围內——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最后按照社会主义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说从反面去阐明其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自身的发展，迅速地接近这样的一点：就是它自身不可能再存在下去。这一批判，证明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愈益成了生产本身的不可忍受的桎梏；证明出：这种形式所必然形成的分配方式，造成了这样的、日益不可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一方面数量愈益减少、财富愈益增加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数量愈益增大、情况一般说愈益恶化的无产的雇佣工人，这两方面之間日益尖锐化的对抗。结束，这一批判证明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所造成的、而它自己已经无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那样一种为了共同的有计划的工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把它们拿过来，以便保证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生活资料 and 自由发展其能力的条件，而且其程度将日益往上增长。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53—154页）

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十七世纪末，在一些天才人物的

头脑里已經产生了，可是象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所作的那样正面的定式化，却實質上是十八世紀的产兒，它是与其当代伟大的法兰西启蒙学者的成就相并立的，并且和他們一起共同帶着那个时代的所有优点和缺点。我們关于启蒙学者所說的話，也可以用于那时的經濟学家，在他們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們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經濟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規律，不是由历史規定的那种經濟活动形式的規律，而是自然的永恒規律：这些規律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可是，仔細予以研究，就可以看到，这里所說的人，只不过是当时正处在轉变为资产者的过程中的那些中等市民罢了，而他的本性，也不过是在于根据当时的由历史規定的关系，来从事生产和貿易罢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54—155頁）

馬克思既認為經濟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物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礎，于是他就特別注意研究这个經濟制度。馬克思底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专为研究現代社会即資本主义社会底經濟制度而作的。

（列宁：“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1913年3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1949年外文出版局莫斯科版，第66頁）

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学是“研究人类各种不同社会中借以进行生产和交换，及与此相适应，借以經常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反杜林論）。因此，政治經濟学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經濟发展法則，而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經濟发展法則。

大家知道，列宁是完全同意这点的，他在批判布哈林的小册子“过渡时期的經濟”时說，布哈林把政治經濟学的作用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首先是局限于資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他同时指出，在这里，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后退了一步”。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未定稿中所提供的政治經濟学的定义，是与此十分符合的。在这未定稿中說：政治經濟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不同阶段上物質資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法則”的科

学。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生产力組織問題来代替經濟問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生产力合理組織的問題、国民經济计划化的問題等等，并不是政治經濟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經濟政策的对象。这是两种不同的領域，不能混为一談。雅罗申柯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經濟学是研究人們生产关系发展的法則；經濟政策則由此作出实际結論，把它們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經濟政策的問題堆压在政治經濟学上，就是戕害这门科学。

政治經濟学的对象是人們的生产关系、即經濟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关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动”；（丙）完全以甲乙二項为轉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經濟学的对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63—65頁）

……政治經濟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們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組織。这些社会关系——是彻底被闡明了和分析了——每一階級在生产中的地位，从而每一階級所获得的国民消費的分額因此决定了。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3頁）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間的关系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間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与他們当时物質生产力的—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賴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質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

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在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種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去與人們所借以意識到這種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這種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餘地的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們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胎兒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會提出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我們仔細去看時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借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大體說來，亞洲生產方式、古代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可以看成為社會經濟形態發展中的幾個演進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乃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个對抗形式，所謂對抗，並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生活的社會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着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所以人類社會的前期歷史也就以這個社會形態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185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340—342頁）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所有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的和國家的關係，一切宗教的和法律的體系，一切理論的觀點，都只有在

了解了每个相应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后才能了解，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引导出来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乃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所谓对抗，并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各个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着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这样，当我们把我们唯物主义的论点加以进一步发挥并把它应用于现代生活时，一个伟大革命——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的远景，就立即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859年，

“马克思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46页）

雅罗申柯同志从这一切便作出结论说，对于一切社会形态，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有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应当不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

雅罗申柯同志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观点可以讲些什么呢？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限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大家知道，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

不可以說，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它真正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沒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靡下去，如象現在資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4—56頁）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而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并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現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經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頁）

……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質資料）和生产关系（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們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們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們能够互相影响。……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頁）

經 济 范 疇

这各种形态，形成资产階級經濟学的各种范畴。那些范畴，对于这种历史地决定了的社会生产方式（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地妥当的，从而是客觀的思惟形态。但我們只要逃到別种生产形态中去，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生产物的一切魔法妖术，就都立即消灭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年—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8頁）

我們以上考察的各种經濟范疇，也都帶有它們的历史的痕迹。在生产物当作商品的存在中，是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为要变成商品，生产物應該不是当作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活資料来生产。如果我們进一步研究了，在什么情形下，生产物会全部或多数取得商品形态，我們就会发觉，那是以一种极特别的生产方式，即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但这种研究，和商品的分析还是离得很远。尽管生产物的最大部分还是直接为着生产者自己的需要，不变成商品，社会的生产过程也还没有依完全的广度和深度由交换价值支配，在其內，也仍然能够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生。当然，生产物之商品的表现，会在社会內部引起一个这样发展的分工，以致由直接物物交换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裂，早就已經完成。不过这样的发展程度，是历史上最不同的各种經濟社会形态所共有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年—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79—180頁)

經濟規律

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則——無論是指自然科学法則或政治經濟学法則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們能发现这些法則，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来为社会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法則，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学法則。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頁)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这样說。工人階級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的法則，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質相适合。工人階級能够做到了这件事，并不是由于它的特殊本領，而是因为它对于这件事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已从资产階級革命初期的先进力量变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曾經

竭力反抗这一法则的实现。——它之所以反抗，并不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性，也不是因为经济过程的自发性推动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于它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要来反对这一法则的实现。

由此可见：

一、在某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这样的事情也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而且在其他社会形态下也发生。

二、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法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利用经济法则为社会谋福利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反抗这件事情。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4页)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生产物的商品形态或商品的价值形态，就是经济的细胞形态。在浅薄的人看来，这种形态的分析，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细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诚然只是一些琐细的事情，但和显微镜下的解剖，正好是做一样的事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

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这一点，可以由关于本書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看出来。

例如，巴黎的“实证主义评论”责备我，说我一方面使用形而上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说说看罢——只从事于已知事实之批判的分析，不为将来的食堂，写出调味的方方法来(孔德主义的嗎?)。关于形而上学云云的责难，西伯尔教授曾答说：“在所论为真正的理论时，马克思的方法，不外是整个英吉利学派所通用的演绎法。其缺点与优点，是一切最上乘的理论经济学家所

共同的。”布洛克先生在“德意志社会主义理論家”一文(1872年7月号8月号“經濟杂志”的摘要)中,却發現我的方法是分析的,并且說:“由这个著作,馬克思先生要算在最有分析能力的人物中間了。”德国的評論家,自然会就黑格尔式的詭辯,大肆咆哮。彼得堡“欧洲通信”一篇專門討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見1872年5月号427頁至436),說我的研究方法,严格地是实在論的,但叙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辯証法的。他說:“驟然依照它叙述的外形来判断,我們會說,馬克思是最大的一位观念論哲學者,并且是从坏的方面解释的德意志式的观念論哲學者。但在經濟学的批判的工作上,他与任一个他的先驅者比較,都无比地更是实在論者。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序,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13—14頁)

“在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从事研究的現象的法則。他認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現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間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內支配着各种現象的法則。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現象之变化的法則,发展的法則,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則。这种法則一經由他发现,他就要詳細研究这个法則在社会生活上表現出来的各种結果。……所以,馬克思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由严密的科学研究,証明社会关系上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并对于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各种事实,尽可能予以完全的確認。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証明現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証明別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不管人是否相信,不管人是否意識到,現存的秩序,总是必須推移到这个別一种秩序去的。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則,不仅和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图是独立的,却宁說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图的。……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的位置既然如此低,那就不說自明,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識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結果来做基础。……有人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是永远同一的;适用于現在,适用于过去,都是一样的。但这

正是馬克思否定的。依他說，抽象的法則是不存在的。……依照他的意見，正好相反，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法則。……生命通過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個階段向他一階段推移時，它就開始要由別一些法則去支配。總之，經濟生活上表現了一種現象，與生物學其他領域內的发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以經濟法則比于物理學法則或化學法則時，是把經濟法則的性質誤解了。……更深刻地把現象分析一下，就知道諸種社會有機體，是和諸種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有根本的區別。……并且，同一種現象，也因各種有機體的全部構造不相同，因它們的個別器官有差別，因這各種器官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發生作用等等原故，須受支配于完全不同的法則。例如，馬克思就否認人口法則是任何時候何地都相同的。反過來，他是主張，各發展階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則。……生產力的發展不同，社會關係與支配社會關係的法則也不同。馬克思把這個目標放在面前，從這個見地去研究并且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時，他不過要嚴密科學地，把經濟生活每一種正確研究所必須有的這個目標，樹立起來。……這樣一種研究的科學價值，是在於說明，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發生、生存、發展，死滅，以及它由別一個更高級的社會有機體來代替的事實，是受着怎樣一些特殊的法則支配。馬克思這部書實際上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如此正確地描寫了我的現實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這個方法在我手上的應用時，又如此好意地描寫了它，他所描寫的，不是辯證法，又還是什麼呢？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序，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17頁）

我們不要在這裡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法則，如何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如何當作競爭的強制法則來發生作用，如何在個別的資本家意識中成為發動的動機。但這是很明白的，天體的現象運動，只有認識其現實運動（不能由感官直接知覺到的運動）的人，方才是可以理解的；同樣，必須先把握住資本的內部

性質，競爭之科学的分析，方才是可能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6頁)

……人們研究了勞動的市場價格和它的所謂價值的區別，研究了這個價值和利潤率，和勞動所生產的商品價值等等的關係，但從來沒有發現，他們的分析不但曾由勞動的市場價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價值，並且已經把勞動的價值，再分解為勞動力的價值。古典經濟學關於他們自己的分析的這種結果，一點沒有意識到；他們不加批判地，把“勞動的價值”，“勞動的自然價格”等等，當作要在这里討論的價值關係之最後的適當的表現，而糾纏不清。其結果，就如後面所說，是陷入不可究詰的混亂與矛盾中。同時，它又為庸俗經濟學的淺薄性，給予了一個堅實的地盤，使它好在原則上只盡忠於現象的外表。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64頁)

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發揮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講空話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領會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

(恩格斯：“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1859年。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47頁)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原是新唯物主义見解的直接理論前提，因此就為邏輯的方法也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馬克思曾經是而且現在还是这样唯一的一个人，他能于担起重大任务来从黑格尔的邏輯中取出那包含有黑格尔在这方面所作真正发现的內核，从而恢复辯證法，除去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而付予它以使它成为唯一正确思想发展形式的純朴形态。作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的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来是意义未必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即令按照已經获得的方法，也可以